

背景與文本：玄奘和《大唐西域記》的歷史化

伍國

美國阿勒格尼學院 (Allegheny College)

摘 要：《大唐西域記》的內容來自於玄奘對世俗事務的長期興趣。該書的彙編是對唐太宗李世民的帝王命令的回應，而這個命令的主要目標就是為他準備征服和統治的西域搜集實情。該書的體例和重點，通過記載當地物產與風俗，傳達出對當地人的道德判斷，承襲了中國傳統地理書籍、方志和正史中的西部邊疆部分。本書的民族志性質，玄奘對世俗事務的關注和對經驗研究的興趣，及其向皇帝提供資訊的目標，都是為實現深入和多方面地理解該書而需要掌握的重要方面。

關鍵詞：唐太宗、李世民、玄奘、大唐西域記

作為一名佛教哲學家和求法僧，玄奘的學問和關注點與他的時代是分不開的。他“繼承了‘學問僧’重視歷史與地理的學術傳統，這一傳統為玄奘朝聖之旅的先行者們所信奉，他閱讀了前朝僧人們比如法顯、道安、慧生等人論述印度和西域的著作，儘管除了法顯的《佛國記》，其他著作已經佚失了。”¹ 該書的體例深受中國正史書寫和方志類型的影響。在正史《漢書》中，已經有名為《西域傳》的部分。作者，後漢的班固採用了“傳”來命名的這一部分，實際上是對西域諸國的一次地理調查。方志作為一種歷史—地理撰寫體例，出現於後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方志有較大發展。三國時期出現了十二種地方誌，南北朝時期則有九種，其中常璩的《華陽國志》影響最大。² 這一時期，地方誌的類型也經歷了變化的趨勢：東漢魏晉時代的作者們關注的主要對象是“異物”，而晉宋以後，地志關注的對象則主要是山水風光。隋唐以後，伴隨著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重建，地理思想日益偏重於實用。³ 唐代學者們反思過去的地方誌，批評六朝忽視“關係國計民生的有用內容……”⁴ 在唐朝，隨著多民族中央集權帝國的建立，地理作為中國傳統學術中史學部分的附屬物，變得突出起來，而且越來越與唐不斷崛起的國家霸權和持續的軍事征討的關係緊密起來。在玄奘這個案例中，魏晉南北朝方志已經出現的對地方經濟、地理、風俗、物產進行廣泛記載的做法被繼承下來。⁵ 事實上，玄奘在《大唐西域記》的序言裡提到了“方志”這個詞，在這

¹ 馬佩《玄奘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29–130頁。

² 劉重來《〈華陽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第97–98頁。

³ 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60頁。

⁴ 同上，第176頁。

⁵ 中國方誌的體例發展變化，見戴鞍鋼《中國地方誌精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7–28頁。

個序言裡玄奘還批評了過去的地理著作和方志對廣大世界和不同人們的“未傳”或“不暨”。⁶

《大唐西域記》有明顯的正史特徵，它的完成主要是為了滿足太宗瞭解西域的渴望和他為撰寫提供的贊助。對太宗來說，命令撰寫這樣一部方志是“為了瞭解西域的情況，以備將來對突厥用兵參考”。⁷這裡，《大唐西域記》的目的與其他地方志沒有太大區別，因為他們都與儒家大一統理想相關。這種象徵意義在後來清代學者為一個縣志所做的序言中表達的很清楚，“地必有志，所以大一統。”⁸方志作者對於所研究的地方來說通常都是本地人，而無疑玄奘不是西域本地人。然而《大唐西域記》也沒有效仿《史記》運用的既定的紀傳體體例，或《漢書》的斷代史體例。相反，它是一種主要基於玄奘所經歷地域的地理研究的綜合性敘述。湯用彤先生把《大唐西域記》列入“西域地志”目錄中，這部分湯先生列了僧人所撰著作共計八種。湯用彤指出，其中包括《大唐西域記》在內的三種，明確是秉承帝國官府之命而撰寫的。⁹

一般認為唐太宗李世民可能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不僅促進《大唐西域記》的撰寫，而且贊助大規模翻譯佛經，這導致對太宗產生誤解。其實太宗更多地是一個政治軍事領袖而不是一個佛教徒。正如湯用彤指出的，“唐太宗實不以信佛見稱”，他之所以贊助玄奘，“或僅為聖朝點綴，但似亦有政治關係”。湯用彤也詳細分析了唐太宗不信仰佛教的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他崇尚儒家文治，“認為佛法無益

⁶ 季羨林《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⁷ 林天蔚《地方文獻研究與分類》，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9頁。

⁸ 李龍官、徐尚忠《連城縣誌》，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頁。

⁹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0-81頁。

於平天下”。第二，唐太宗“自以為系李老君之後，故嘗先道後佛”。此外，湯用彤也指出，唐太宗對不同宗教信仰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並且常常從其政治需要出發。¹⁰

相對於佛教，太宗對儒家的尊重更深。根據《貞觀政要》的記載，太宗即位第一年，即西元 626 年，皇帝下令“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並“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在 627 年，太宗“詔停以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¹¹ 因此“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¹² 如果對佛教的態度上有一種務實的政治考慮，那麼建立正統的儒學譜系，就是一種非功利主義的立場和努力。此外，太宗的思想確實有和平和反戰的一面。他聲稱“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¹³ 這很明顯是受《道德經》“夫兵者，不祥之器”說法的影響。¹⁴

太宗對比他年輕四歲的玄奘的態度，並非出自於佛教的信仰，而是出自對玄奘的才智和毅力的獎賞。首先，當玄奘在 629 年離開唐帝國的時候，由於突厥的威脅，越境之禁甚嚴，“玄奘乃偷越玉門關。”¹⁵ 湯用彤承認太宗“或較前信佛”是因為玄奘的影響，但他“對於奘師所以特加優禮，實亦由於愛才。”¹⁶ 當玄奘於 645 年歸國時，他希望太

¹⁰ 同上，第 10–12 頁。

¹¹ 駢宇騫等譯注《中華經典藏書·貞觀政要》，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 229–230 頁。

¹² 同上，第 230 頁。

¹³ 同上，第 292–293 頁。

¹⁴ Laozi, and Robert G. Henricks, *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London: Bodley Head, 1990, p. 83.

¹⁵ 王仲聲《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934 頁。

¹⁶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0–12 頁。

宗能贊立譯場，搜擢賢明，幫助建立一支梵文翻譯團隊來翻譯佛經，但是“太宗謝絕奘師之請”。不僅如此，據湯用彤所言，太宗還試圖“請法師還俗，共謀朝政。”¹⁷ 芮沃壽甚至提出，儘管太宗贊助佛教，但他懷著“標準的反佛偏見”，而佛教徒尋求誇大“太宗與玄奘緊密關係以及他後期對佛教產生興趣的程度。”¹⁸ 中國學者傅新毅晚近的一項玄奘傳記研究提供了更多關於理解太宗和玄奘關係方面的洞見：1，太宗為玄奘的譯著作序，並許諾他大量僧人，部分出自於太宗對他所積累起來的德行的關注；2，相對於翻譯佛經太宗更感興趣的是《大唐西域記》的實用信息；3，在讀過《大唐西域記》之後太宗纔堅定地認為玄奘具有從政任職的潛力。¹⁹

在玄奘和太宗的互動中，掌握主動權的是玄奘。在 644 年，在他歸國途中停留於閩時，玄奘寫了一封自薦信，通過一名來自高昌的俗家信使轉呈太宗。²⁰ 可以想見正是這封信引起了太宗對玄奘的認真的興趣。在《續高僧傳》，唐代僧人道宣對《大唐西域記》的撰寫過程提供了一種兩可說法：首先，道宣引用太宗的話解釋了太宗對玄奘譯經提議的不熱心態度，這些話表達了對邀請其他僧人加入譯經事業可能會降低質量的擔心。換句話說，太宗不反對玄奘以一人之力譯經而懷疑集體翻譯的可行性。據道宣記載，玄奘的回應是以鳩摩羅什

¹⁷ 同上，第 13 頁。

¹⁸ Wright, Arthur F, “T’ang T’ai-tsung and Buddhism.”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s.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 254–255,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¹⁹ 傅新毅《玄奘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58–61 頁。

²⁰ Wang Ding, *Xuanzang’s Helpers from Turfan: Some Notes Based on Medieval Chinese Manuscripts*, 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63, No.3 (September 2010), pp. 363-378. p. 375.

為例說明合作譯經的必要性，最終說服了太宗。其次，道宣從未表示《大唐西域記》的撰寫是太宗給玄奘的任務。相反，道宣的敘述把該書的撰寫放在一個眾多佛經翻譯的更大背景之中，他甚至說：“（當玄奘）微有餘隙，（他）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似乎玄奘把它作為其宏大翻譯事業的一個小插曲。第三，道宣並未說明玄奘口述、辯機筆受，因為他說辯機“連紕前後”，也就是編輯了手稿並略加整理，因為他用了“錄文”一詞來明確地表示智證和其他僧人助手對玄奘口述《大乘對法論》的記錄。²¹很可能為了突出玄奘的聰明自主和非凡魅力，道宣有意避開了太宗命令玄奘撰寫此書的事實，但是道宣表明的玄奘的撰述此書的熱情看起來和他在 644 年積極主動地聯絡太宗是一致的。而且，道宣敘述的關於玄奘和辯機各自扮演的角色，即玄奘著、辯機整理，似乎也更加準確。

當代佛教研究學者傅新毅強調，玄奘撰寫《大唐西域記》純粹是一種對太宗慷慨支持的回報，而且也把太宗當作唯一的讀者，同時，玄奘也試圖避免花太多時間作為“文學侍臣”在朝陪伴太宗和高宗，以保持他自己知識人的自主性。²²玄奘把帝王作為自己撰寫一部書的目標受眾，在序言中自覺地把中國歷史追溯到傳說中的文化英雄伏羲、軒轅、堯、舜，“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²³玄奘強調撰寫《大唐西域記》的目的是要達到“化洽”西域人民的目標：“（如果大唐的武功與文德）不有所

²¹ 道宣《續高僧傳》卷四，《大正藏》編號 2060，第 50 冊，第 455 頁上欄第 19–22 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版，2018 年 9 月 6 日讀取 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0/T50n2060.pdf

²² 傅新毅《玄奘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61 頁。

²³ 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32 頁。

敘，何記化洽？”²⁴ 芮沃壽對玄奘的真實目的做了一個有趣且明智的推測：通過“討好”這位至高無上的保護人來使太宗培養起一種對佛教更加有利的態度。²⁵

然而，一種用回鶻—突厥語書寫的第一手文獻，提供了一個關於玄奘與兩位唐代帝王，即太宗尤其是高宗關係的新視角。首先，637年太宗公開宣布道教教主以李耳為名的老子是其祖先，（老子）的位置應當放在佛祖之前。²⁶ 玄奘歸國之後需要在其他僧人們的努力失敗之後來糾正這一點，他還請求太宗廢除相關法令，它導致了違反世俗刑法的僧尼所受的懲罰。²⁷ 其次，玄奘多次上書給高宗請求皇帝給寺廟碑刻賜予手書並為此對皇帝表示感恩。在另一個例子中，玄奘要求皇帝同意他遷葬父母的請求。而且玄奘從未停止用好言好語奉承高宗皇帝，並許諾回報皇帝的仁慈。²⁸

玄奘的調查性旅程以佛教目的為主，但也帶有政治和民族志方面的關切，這種旅行不是孤立的，在他之前還有官方的宋雲和僧人慧生，作為北魏的使者出使西域和印度，去瞭解沿途諸國的形勢，這兩位使者的各國記錄非常接近玄奘。例如宋雲和慧生記錄道：“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宋雲和慧生的

²⁴ 同上。

²⁵ 前揭 Arthur F. Wright, “T’ang T’ai-tsung and Buddhism,” p. 255.

²⁶ Kahar Barat, *The Uygur-Turkic Biography of the Sev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 Xuanzang, Ninth and Ten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4.

²⁷ 同上，第 78 頁。

²⁸ 同上，第 16 頁，第 40 頁，第 120 頁。

記載已經佚失，有部分可以在東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讀到。可以肯定地說，玄奘在出發前讀過《洛陽伽藍記》，事實上，他旅程中的歷國而記，類似於《洛陽伽藍記》中宋雲的記錄。唯一的區別可能是玄奘的記載更加詳細、更成系統，他也沒有運用宋雲的語言風格，即流行於南朝的四字駢文類型。

唐初政治軍事形勢確實需要確切的西域知識。正如陳寅恪指出的，“李唐一代為吾國與外族接觸繁多，而甚有光榮之時期……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²⁹ 如我們上文指出，唐太宗同時深受儒家、道教意識形態影響。從隋朝的滅亡吸取教訓，唐太宗並非極富侵略性，他對東突厥、高昌、焉耆、龟兹的軍事行動都出自自衛的目的，主要目標是保護唐帝國對西方貿易的可靠交通線。歷史學家岑仲勉的說法是公允的：唐初對西域諸國的遠征不能被簡單看作是侵略，因為唐太宗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領土和政治統治，而是“為經濟爭生存”。³⁰

季羨林的評論很恰當，“玄奘是一個非常細心的觀察家。他對宗教現象觀察得記錄得特別細緻。他所到之處，不管停留時間多麼短暫，他對當時各宗教力量的對比都詳加記錄。”³¹ 儘管如此，這仍是不充分的。仔細研讀《大唐西域記》的文本就會發現，玄奘對世俗事務顯出同樣的興趣。儘管玄奘沒有接受唐太宗還俗從政的要求，而是把撰寫該書作為一種職責，但《大唐西域記》本身的豐富內容的確顯示，玄奘在旅途中對俗事和政務決非毫無興趣，否則他不可能寫出所有的

²⁹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8頁。

³⁰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96–97頁。

³¹ 季羨林《玄奘與〈大唐西域記〉》，收於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6頁。該書在季羨林序言之後，重新從第1頁標起。

詳細資料。在他被要求撰寫這部書之前，玄奘肯定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材料來撰寫這部十二卷本的著作，不管有沒有後來皇帝的命令，玄奘對帝國的地方知識的興趣是自發和誠懇的。因此該書獲得一種雙重性質：一種基於一手觀察的地方狀況的真實的個人敘述，一種為最高當局提供信息的官方的方志。

	疆域 / 地形	物 產	語言和 文字	貨 幣	政 治	佛 寺	採 礦	服 飾	體貌 / 社會習俗
阿耆尼國	+	+	+	+	+	+	-	-	+
屈支國	+	+	+	+	+	+	+	-	-
跋祿迦國	+	+	+	-	-	+	-	-	-
羯霜那國	-	-	+	-	-	-	-	+	+
覲貨邏國	+	-	+	-	+	-	-	+	+
颯秣建國	+	+	-	-	-	-	-	-	+
迦畢試國	+	+	+	+	+	+	-	+	+
婆羅痾斯國	+	+	-	-	-	+	-	+	+
摩揭陀國	+	+	-	-	+	+	-	-	+

為了達到為明智的、潛在的統治提供綜合的經驗性知識的目標，《大唐西域記》對玄奘所經歷各國的地理、文化、經濟狀況著墨甚多。為了說明玄奘所關注的以及他想向太宗展示的關鍵事物，我製作了上面的表格。（“+”表示有此種現象的記錄；“-”意味著沒有。）

本表顯示，玄奘為了服務於自己的撰寫目的，他所經歷和參訪之國是否有佛寺並非最重要的問題，而他提到的疆域、範圍、地形卻是最重要的主題，通常被放置於官修方志的最前列。

方志和《大唐西域記》共同關注的下一個重點事項是地方風俗。玄奘對地方風俗的評價與世俗和儒家的判斷沒有太大區別。比如，玄奘評論阿耆尼國“國無綱紀，法不整肅。”³² 他也很注意所經歷的地方是否有君主及其政治歸屬。當他描述跋祿迦國的素葉水城時，玄奘強調，“素葉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³³ 這裡重點強調這些城市與突厥的政治關聯以滿足太宗的需求。至於社會風俗方面，玄奘非常頻繁地使用“天然的”（質）和“單純的”（淳）等詞來讚美，也用批評當地人的一些詞語和表達，包括“動止輕躁”、“情懷詭詐”、“志性恆怯，容貌鄙陋”、“言辭鄙褻，婚姻雜亂。”另外兩個短語“其風俗缺乏禮儀和正義（俗無禮義）”和“其風俗缺少禮儀和法規（俗無禮法）”，也常常為玄奘用來為其所經歷諸國的居民下斷語。同時，玄奘似乎頗欣賞摩訶刺佉國的騎士精神：“（居民）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陵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³⁴ 正如傳統中國哲學研究專家萬百安正確指出，“（儒家學說）一個重要的智慧是能夠判斷他人的特性。”³⁵ 我認為玄奘的判斷性評價可以被看作是根本性的儒家智慧的展現，在撰寫該書時，它們服務於皇帝調查事實的目的。而且，這種對玄奘的觀察與判斷進行現場的、實事求是的記錄，是玄奘忠實於自我的另一個跡象。

玄奘對世俗社會的觀察和記錄類似法顯在《佛國記》裡的記載。

³² 同上，第 48 頁。

³³ 同上，第 72 頁。

³⁴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891 頁。

³⁵ Bryan W. Van Norde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11, p. 40.

《佛國記》早於《大唐西域記》，完成於東晉，也有儒家正史的特徵。比如，法顯在《佛國記》描述焉耆即阿耆尼國的居民，“不修禮義，遇客甚薄，”這和玄奘200多年後在同一國對同一批人的評價很接近，“（他們）勇而寡略，好自稱伐。”³⁶ 法顯在記錄竭叉國（玄奘時代的屈支國）時也很關注當地農業，發出這樣的評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³⁷

玄奘立基於中原正朔對非華夏政治與文化的判斷性評價也不是孤立的。在《漢書》對西域的記述中，就有類似“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的話。³⁸ 也可以和一些漢族儒家學者的民族志著作相比較，比如唐代的《蠻書》、晚清地理著作《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在魏源《聖武記》裡對定義西南的苗和蠻分別提出兩個標準，“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和“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³⁹ 然而，當這些最典型的儒家官方語言被佛教僧人援引時，看起來佛教觀察家玄奘已經有意無意地內化了儒家價值觀，就像他同時接受了正統史學撰述體例一樣。孔子在《論語》中被記錄下的話“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朱熹對此加以評註，判斷好惡要沒有私心，要和原則即理保持一致。⁴⁰ 如果把《大唐西域記》的撰寫看作是玄奘和太宗的互動過程，那麼這種依賴於語境的行為被其目的——提供太宗需要的信息——所操縱。

該書的一些部分進一步表明玄奘為誰而撰的清醒意識。在《大唐

³⁶ 法顯《佛國記》，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年，第50頁。

³⁷ 同上，第75頁。

³⁸ 班固《漢書》卷九十六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3930頁。

³⁹ 魏源《聖武記》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83頁。

⁴⁰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9頁。

西域記》卷二，玄奘對此行的目的地——印度，進行了詳細說明。冠以“賦稅”之名的一部分尤其有趣。這裡玄奘強調在印度“戶不籍書，人無徭課……賦斂輕薄，徭稅簡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玄奘反覆強調，在印度“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⁴¹ 出生於隋朝且深通史書的玄奘知道得很清楚，沉重的賦稅是導致隋朝覆亡的一個主要原因。在做出這些撰述之前，玄奘已經很崇敬地把太宗介紹給印度戒日王，說他是一個“降低賦稅，減少刑罰”的仁慈的統治者，大唐國是一個有“豐盈歲入”、“無人違法”的國家。⁴² 很明顯，玄奘非常關注百姓生計，他想要給太宗傳達這樣的資訊：對於平均土地、降低賦稅和徭役等他知道太宗很欣賞的政策，他本人也很支持。很明顯唐太宗非常清楚正是因为“人力不堪，相聚為賊”，因此他說他“不敢輕用人力”，他“唯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⁴³ 玄奘對印度賦稅和徭役制度的說明應該是為了通過引用國外的例子來加強太宗關懷民眾的認識。

另一個地方也反映出玄奘的讀者意識。儘管 628 年他離開大唐之後、進入阿耆尼國之前，曾經在高昌王國停留了一個多月，並受到很熱情的款待，但在《大唐西域記》裡他對高昌僅僅一筆帶過：“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⁴⁴ 玄奘對高昌看似務實的遺漏，其原

⁴¹ 《大唐西域記》卷二，收於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68 頁。

⁴² Tansen Sen, “The Travel Records of Chinese Pilgrims Faxian, Xuzang, and Yijing: Sources for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Ancient India,” *Educating about Asia*, vol. 11, no.3 (Winter 2006): 30.

⁴³ 駢宇騫等譯注《中華經典藏書·貞觀政要》，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 313 頁。

⁴⁴ 《大唐西域記》卷二，收於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46 頁。

因明顯是因為唐政府於 640 年滅亡了高昌並建立了安西前線司令部（即安西都護府），當玄奘於 646 年撰寫其志書時，對他來說已經沒有必要描述已經被置於唐政府統治之下的高昌的情況了。

誠然，玄奘西行最初的關進動機是尋求獨立研究以獲得佛理。正如《舊唐書》指出的，玄奘不滿他讀到的譯經，希望發現其他版本來進行比較和對勘。這個過程本身也和儒家學者對儒家經典的文本校勘和修訂是相同的。湯用彤在揭示學問努力與儀式虔敬之間的差別時也注意到這個方面。當討論魏僧人朱士行於 260 年出發尋求佛經時，湯用彤評論道：“士行（追求）之所謂佛法者，乃重在學問，非復東漢齋祀之教矣。”⁴⁵ 在這個評論之後，湯用彤馬上引用後於朱士行約 400 年的玄奘的例子，來強化他的論證。他說朱士行和玄奘“二人之造詣事功，實不相侔。而其志願風骨，確足相埒也。”⁴⁶ 有爭議的是湯用彤相信朱士行和玄奘對佛教的態度中都是學問多過儀式的。

儘管該書是作為一個官方項目完成和面世的，玄奘本人確實對他所經歷諸國的世俗事務有著很大興趣。他固有的學者風範、實證主義傾向與他對許多非佛教生活細節的真實興趣之間有密切聯繫。閱讀《大唐西域記》並不能說服讀者相信玄奘是僅憑記憶記錄下所有內容的。旅行持續了十幾年，玄奘經歷了或至少提到了一百個國家且都有令人吃驚的細節。比如，單就阿耨尼國而言，書中記錄了六種當地作物：黍（糜黍），第二年成熟的麥子（宿麥）、芳香的棗子（香棗）、葡萄（蒲萄）、梨子（梨），以及野蘋果（柰）。推測起來，如果沒有堅持旅行日記並對俗事付出密切關注，沒有人能寫出有這麼多細

⁴⁵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 年，第 138 頁。

⁴⁶ 同上。

節的整本書。正如我前面所說的，自從玄奘歸國後觀見了唐太宗，此後他關於這些途中細節的最初記錄或回憶具有高度個人化和自發性，這應該是由他的堅持不懈的旅行日記所決定的。出身於“儒學世家”，是“陳寔——一位著名的東漢大臣——的後裔”，玄奘在受戒之前深受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他八歲時父親教他讀儒家的《孝經》，他就能對答得十分得體。⁴⁷ 最後佛教僧人觀察和記錄外國自然與社會狀況的早期傳統也影響了他。

正如季羨林指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深深喜愛歷史的民族，也是一個深深喜愛地理的民族”，而且“中國和尚還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特點：他們喜愛歷史，也喜愛地理。”⁴⁸ 作為一名具有實證精神和世俗關懷的學問僧，玄奘也是一位早期的民族志學者。他的旅行既是宗教性的也是世俗性的，《大唐西域記》的文本是草創、選擇和編輯等多層面的結果。這裡我們要銘記，旅行並不但意味著到達目的地，而且是蘊含其中的“人的自我實現”，也即“每個人的哲學和世俗知識的源頭。”⁴⁹ 在此過程中，玄奘下意識地觀察並記錄了西域和印度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許多細節，他的民族志的和評判性的體例，也離不開在玄奘著書的時代被確立起來的中國方志傳統。在讀者方面，玄奘首要的是為他的個人興趣而蒐集資料，但是當機會自己出現時，也就是皇帝想要閱讀整本書作為參考時，玄奘撰寫並以政治修辭和為帝王建言之潛在含義裝飾了該書。

⁴⁷ 章巽、芮傳明《國學經典導讀：大唐西域記》，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0年。

⁴⁸ 季羨林《玄奘與〈大唐西域記〉》，收於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3頁。

⁴⁹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 8.

在這個意義上，該書混合了匹配其雙重角色的兩個部分：基於玄奘最初觀察的事實和判斷的部分，和以太宗為對象的修飾和建言的部分，該書是從玄奘的記憶和可能的筆記、再到民族志學的草稿、最後到帶有政治修飾的完整著作的不斷重寫的結果。士人與政治的向度也被整合進來，因為基於草稿的量身定製的敘事旨在服務於未來征服與統治的目的，比如在對高昌的遺漏、對印度賦稅制度的強調等例子中。不言而喻，玄奘是一位偉大的、有獻身精神的高僧、翻譯家和淵博的哲學家，然而他根深蒂固的世俗情感和良好的政治技巧，就如在《大唐西域記》裡所反映出的那樣，使他作為一位全才的中國士人的形象更加複雜和豐滿。這就是太宗兩次要求他從政擔任政府職務的原因：他一定是看到了在玄奘身上有他所需要的政治天賦。

參考文獻

原始文獻

-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玄奘（602–664）、辯機（？–649）著，季羨林等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佛國記》一卷，（東晉）法顯（337–422年），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年。
- 《聖武記》十四卷，（清）魏源（1794–1857年），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續高僧傳》三十卷，（唐）道宣（596–667）撰，《大正藏》編號2060，第50冊。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版，2018年9月6日讀取 <http://>

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0/T50n2060.pdf

《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32-92）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四書章句集注》二十六卷，（宋）朱熹（1130-1200）編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東亞語研究

王仲榮《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岑仲勉《隋唐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李龍官、徐尚忠《連城縣誌》，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

季羨林《玄奘與《大唐西域記》》，收於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38頁。

林天蔚《地方文獻研究與分類》，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

（譯者注：譯者所見的此書書名應為《地方文獻研究與分論》）

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馬佩《玄奘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

章巽、芮傳明《國學經典導讀：大唐西域記》，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0年。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傅新毅《玄奘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年。

駢宇騫等譯註《中華經典藏書·貞觀政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劉重來《〈華陽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戴鞍鋼《中國地方誌精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西文研究

Barat, Kahar. *The Uygur-Turkic Biography of the Sev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 Xuanzang, Ninth and Tenth Chapt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Fabian, Johannes.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Laozi, and Robert G. Henricks. *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London: Bodley Head, 1990.

Van Norden, Bryan W.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11.

Sen, Tansen. “The Travel Records of Chinese Pilgrims Faxian, Xuzang, and Yijing: Sources for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Ancient India.” *Educating about Asia*, vol. 11, no. 3 (Winter 2006): 24–33.

Wang, Ding “Xuanzang’s Helpers from Turfan: Some Notes Based on Medieval Chinese Manuscript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63, no.3 (September 2010): 363–378.

Wright, Arthur F. “T’ang T’ai-tsung and Buddhism.” I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s.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 239–263.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李志強 譯)